

试论茅盾对中国神话学的贡献

李家兴

我国的神话学起步较晚，“五四”运动以后，一批学者才开始致力于神话研究，刊物著述陆续出现，并在二三十年代达到高潮，形成我国神话学史上一个空前繁荣的时代。但是，至今尚无一部专门著述对我国大半个世纪以来的神话学作出全面的总结，对一些重要的神话学家，作出必要的历史的评价。

尽管如此，开创者们的功绩是不会磨灭的。他们用辛勤的汗水滋润培育了我国神话学这株幼苗，使之不断成长壮大，是我国神话学事业的开拓者。在“五四”时期到三十年代，我国第一批神话学者，象鲁迅、茅盾、周作人、郑振铎、闻一多、江绍原、钟敬文等等，他们作为开拓者，都为我国的神话学事业做出了各自的贡献。而茅盾，是其中的佼佼者。

茅盾吸收外来神话学理论用于中国神话的研究，但又不是生搬硬套，而是根据中国神话的特点，在研究中有所创新，有所发展，并在潜心研究的基础上写出了一批在当时为高水平的论著，取得了独此一家的成果。我认为，这正是茅盾在我国神话学史上的贡献所在，也是他超越与他同时代的研究者们的地方。本文试就他的神话学著述，在这方面浅谈一二。

一

茅盾自己说，他对神话发生兴趣，是在1918年初^①。那时，他开始接触和阅读了大量有关神话的著作，到1925年，才“正式研究

中国神话”。

事实是，茅盾从1916年进入商务印书馆工作后，开始大量阅读西方文献，其中包括许多神话方面的著述。1917年，他就编写了《中国寓言初编》一书。1918年—1923年，他编纂了大量的童话和神话故事。1923年，他到中国共产党主办的上海大学讲授希腊神话。1925年，他在《小说月报》第十六卷第一号发表了他的第一篇神话研究论文《中国神话研究》。此后，在业余时间里，他陆续写出了十多篇著述，对神话中的许多问题进行了探讨。其中，《中国神话研究A B C》最为重要，是体现其研究成果的主要著作^②。

茅盾对神话的研究工作，在1930年基本停止了；到1934年，他写了《中国水神》^③一文后，就完全停止了这一工作。所以，如果把他进行神话研究的准备时期（即1917—1925年）也算进去，他前后从事神话研究工作有十六、七年，其中1925年到1928年这段时间最为突出，主要著作都是在这一时期发表的。

茅盾神话研究著作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两方面：研究阐述中国神话和介绍外国神话（包括神话理论）。他的那些比较集中的论著，反映了茅盾神话研究的实绩和主要观点，也是我们分析、总结和评价其神话研究的主要依据。

在后来的回忆中，茅盾曾明确地说：“为要从头研究欧洲文学的发展，故而研究希腊两大史诗；又因两大史诗即希腊神话之艺术化，故而又研究希腊神话，彼时我以为

希腊地处南欧，则地处北欧之斯堪地纳维亚各民族亦必有神话。……我又思，五千年文明古国之中华民族不可能没有神话，《山海经》殆即中国之神话。因而我又研究中国神话”。^④由此可见，他当时研究神话的目的，是想探究欧洲文学的源头，并不是自觉地从神话学的角度去研究的。但正是他的这一番探究和他的一系列著述，成为我国神话学初创时期最绚丽的一朵鲜花，为我国近代神话学园地增添了光彩。

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考察茅盾研究神话的时代、其研究的经过，至少有这么两点值得我们注意：

第一，茅盾从事神话研究的时间，是在“五四”运动以后。其时，“科学与民主”两面大旗大有插遍全国的趋势，随着各种政治思想思潮涌入中国，各种学术思想和学术理论也竞相争鸣。在这样一种大江奔涌，泥沙俱下的情况下，在进步与保守、解放思想与因循守旧的选择中，茅盾的神话研究具有什么样的特色？有什么样的经验与不足？

其次，茅盾青年时代，先是具有进步的进化论思想，后来通过革命运动，他又逐渐接触、认识以至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观点，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思想的进步、转变，对其学术研究活动必定有一定的影响；但在茅盾的神话研究中，这种影响的程度究竟是怎样的呢？又有什么具体的体现呢？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又该如何认识？

所以，脱离了具体的时代所提供的条件，脱离了研究者本人的思想发展过程及其学术思想的产物——研究著作，我们的分析就无从着手，更谈不上历史地辩证地评价茅盾对神话学的贡献了。

二

茅盾从一开始研究神话，就受了人类学派神话学理论的影响。但是，无论是在一些神话问题的论断之中，还是在神话研究方法上，茅盾都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了一些超出人类学派神话学理论而接近甚至符合马克思主义神话学观点的理论。我认为，正确认识和分析这一点，是公正合理地评价茅盾的神话研究的关键所在。

茅盾在1928年写的《人类学派神话起源的解释》一文，就是介绍人类学派神话学代表人物安德烈·兰（Andrew Lang）的神话观的，并说，“以此说为解释神话的钥匙，几乎无往而不合”^⑤；在《中国神话研究ABC》一书的序中，他说自己“处处用人类学派的神话解释法以权衡中国古籍里的神话材料”；甚至在半个世纪后的一九七八年，已经完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茅盾，仍然认为此学派对神话的解释“尚不算十分背谬”^⑥。

在实际研究中，茅盾也确实接受了人类学派的大部分观点。

例如，在对神话本质的认识问题上，人类学派神话学肯定原始初民的生活及思想对于神话的关系。茅盾根据这一原则，在许多文章著述中给神话下定义时，都肯定神话是原始初民“生活状况、宇宙观、伦理思想”的反映，是想象的结果。在其主要著作《中国神话研究ABC》中，他说：“他们不知道这种特种的东西所谓‘神话’者，原来是初民的知识的积累，其中有初民的宇宙观、宗教思想、道德标准、民族历史最初期的传说，并对于自然界的认识等等。”^⑦

又例如，在研究方法上，他也采用了人类学派神话学的方法，用收集、比较、“取今以证古”等方法进行研究。他对中外神话进行了比较，考察了中国神话中关于羿的记

载，认为羿“正和希腊的海勾力士之无往而不胜利一样”^⑧，是一位无所不能的、“披着神衣的英雄形象”。在论及神话的合理与不合理问题时，他说：“我们固可以假定现代文明民族的神话是经过修改的，然而不能说现代野蛮民族的神话已经过文人的修改；可是现代野蛮民族的内部却已有不少合理的质素了。即此可知神话是自始就包含着合理的和不合理的质素的。”^⑨这是茅盾用人类学派神话学所主张的“取今以证古”方法进行神话研究的一个较典型的例证。

所以，茅盾接受了人类学派神话学的理论并用之于中国神话研究，这一点是十分明显的。那么，我们该如何认识这一点评价这一点呢？

我们知道，“中国人民开始知道马克思的名字，是在1899年”^⑩。在接连不断的革命运动中，中国人民渐渐认识了马克思主义。但是，体现马克思主义神话观点的有关著作传播到国内，还是比较晚的。到1908年，恩格斯的《家庭私有财产及国家之起源》才部分地翻译过来^⑪；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在1928年才由郭沫若翻译过来；一般认为，郭沫若在1930年3月写的《关于文艺的不朽性》，是最早介绍并阐发马克思神话理论的文章^⑫。所以在茅盾研究神话的时候，是不可能得到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神话理论的指导的，因而我们可以说，他之所以用人类学派神话学理论研究神话，是有其历史的和时代的原因的。

我们知道，人类学派神话学理论，是以摩尔根社会进化论为基础的，可以说，人类学派神话学达到了资产阶级神话学的最高水平。在“五四”前后，人类学派神话学传入我国，对我国的神话研究影响极大。正是在这样的时代条件下，当时具有进化论思想的茅盾，接受了人类学派神话学理论，这一点就不足为怪。在系统地马克思主义理论未传

入我国的时候，茅盾一方面大量宣传在当时最为先进的神话学理论——人类学派神话学，一方面汲取其精华，用之于中国神话的研究，我们应该认为这是一种进步，是一种贡献。

但是，值得我们深思的是，为什么在当时许多接受人类学派神话学理论的研究者中，茅盾的成就最高、贡献最大呢？

第一，他接受了人类学派神话学中较合理的因素，但又不是完全拘泥于这一理论使自己身囿其中不能自拔，而是有所创新，有所超越，在许多地方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了更为先进的理论方法（甚至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来进行研究。这是其神话研究中最重要的特色，也是茅盾在神话学上最主要的贡献。

马克思说：“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而，随着这些自然力之实际上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希腊艺术的前提是希腊神话，也就是已经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地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⑬（着重号为笔者所加）所以，社会现实——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社会生产方式等等，决定着艺术（包括神话在内）的内容和特点，而神话正是“现实的虚妄的反映，是被歪曲的理念世界，是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产物”^⑭。茅盾在神话研究中，已经开始认识到这一点，注意到了神话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产生和变异的情形。他说：“有些民族，是在农业生活的基础上得进于文明的，于是他们的信仰遂受了农业上经验的影响，而他们的神话亦呈现农业特色。^⑮”从社会生产的发展去考察神话，正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神话学的观点的，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虽然人类学派十分注重初民的心理状态和生活状况，他们却无法进一步正确地解释究竟是什么东西最终决定初民的心理及生活。因此，他们也就只能在

此裹足不前了。不能从社会生产发展（其中生产力为决定性因素）状况去分析考察神话现象，是人类学派神话学与马克思主义神话学的根本差距所在。茅盾在这里虽然没有再进一步地论述这个问题，但他开始注意到了生产活动对于人们的生活、思想的影响，这显然是大大超过了人类学派神话学一步。

茅盾从“神话和传说初民宇宙观的反映”这一观点出发，在《中国神话研究A B C》中，专节论述了中国初民的宇宙观。宇宙观对神话究竟有什么影响？茅盾认为，宇宙观的不断变化，影响神话的演变和发展。我们知道，科学的宇宙观决定于科学的天文知识；而在远古时代，初民们对日月山川星辰雷电天地万物的认识，其正确程度是极其有限的，所以他们的宇宙观也往往是错误的；不但如此，各民族、不同地区的初民，也有不同的宇宙观。随着时代的前进，知识的发达，人们对宇宙的认识也在逐步地朝正确的方向发展。于是，宇宙观的不同，宇宙观的变化，就影响着神话的演变和发展，决定着神话的特色。早在二十年代，茅盾认识到了这些，是颇为接近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茅盾认为，各民族所居的环境和所遇的经历、经验不同，便有不同的神话。具体说来，在中国，由于南部、中部、北部的环境及人民的经历不一样，造成了“北方人民的严肃的现实的色彩”，而南方及中部民族

“便加上了许多美丽梦幻的色彩”。在此基础上，他创造性地提出将中国的神话分成北部、中部、南部三部分的论点，并分析了它们各自的特点以及后来合流、渗透的情况，最后得出结论说：“现在的中国神话只是全体中之小部，而且片断不复成系统；然此片断的材料亦非一地所产生，如上说，可分为北中南三部；或者此北中南三部的神话本来都是很美丽伟大，各自成为独立的系统，但不幸均以各种原因而歇灭……”^⑩茅盾的这

个理论当然值得商榷，但他于神话学在中国尚属萌芽状态时，在运用人类学派神话学理论的基础上，又大胆地向前跨进一步，联系中国神话的具体情况，提出了独创性的见解，不能不说他是一个榜样。

把神话放到历史的背景中去探讨，是茅盾神话研究的又一特色。在《中国神话研究A B C》第六章中，他说：

“杨慎《山海经补注》以为‘十日’便是‘自甲至癸’的天干；此说颇为新奇可喜，但是太附会了。杨慎不知道神话是发生在原始时代，那时候无所谓‘支干’。……也许就是这种太古有史以前的大旱，便发生了‘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的神话。”^⑪

关于神话的历史化问题，他认为是后人对前人的世界观不理解，因而对前人创造的神话不能理解，才造成了神话的历史化；他批评了王逸、郭璞等人“不知在‘人性的羿’而外，又有一个‘神性的羿’在，不知道羿是被历史化了的神话人物”，所以他们在批注古籍时，都不能“把二者分个清楚”^⑫。

在以上这些问题上，茅盾都是较历史地、发展地看待神话，变化地分析神话，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认识事物、分析事物的方法，也是超过了人类学派神话学的。

第二，茅盾在接受并运用外国神话原理的同时，把主要精力投入对中国古代神话的研究中，并根据中国古代神话的特点进行分析、整理，写出了有价值的专著，并成为我国神话学的开山之作。这是他能取得成就的另一原因，也是其贡献的一部分。

中国古代神话，是全人类最优秀的神话之一。但是，由于历史上各种原因，中国古代神话消亡较早，只有一些零星的不成系统的神话材料，散见于古籍之中。这就给后来

的研究者造成极大的困难，产生了众多的臆测和分歧。与茅盾同时进行研究的一些人，如黄石、林惠祥等人，也写过一些专著，但他们的研究大多只是机械地搬用人类学派的一些观点，对某些神话进行解释，没有创新，价值不大。茅盾就不同了，他早年就选注了《楚辞》、《淮南子》等含中国神话较多的古籍，为后来较全面地研究古代神话奠定了基础。在后来的研究中，针对中国神话消失较早、所剩零碎、伪杂难剔的特点，他非常重视对古籍神话材料进行搜剔，主张以神话的眼光看待这些材料，认为这样才能整理出中国神话的线索。在他的精心搜剔深入研究下，一些有关中国神话的重要问题被提出并纳入他的研究范围。例如，历史上，中国多方士、仙士，他们对于神话有何影响？外国神话与中国神话有无相互渗透、互相影响？等等。这些问题，人类学派神话学是不可能涉及的。要想研究中国神话，只有从中国神话本身着手，才能有所成就。

在这个思想指导下，他把主要精力放在对中国古代神话的分析研究之中，写出了《中国神话A B C》、《楚辞与中国神话》、《中国神话研究》等许多有分量有价值的专著，显示了他研究中国神话的实绩。特别是《中国神话研究A B C》一书，集中反映了他的神话观和研究成果。由于这本书是国内最早有系统地专门论述中国神话的著作，具有开拓性的意义，所以被人们誉为中国近代神话学的开山之作。这本书连同茅盾的其他著述一起，成为中国近代神话学的一笔宝贵财富，为中国现代神话学的发展与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三，在神话研究中，茅盾表现出充分的民族自信心和远见，具有可敬佩的胆魄和敏锐的眼光。

面对零散、杂乱的中国古代神话，他首先想到的是“中国民族确产生过伟大美丽的神话，甚至是极有系统的，只是后来渐渐因

各种原因消失、演变成了而已”。这与当时一些人认为中国没有神话、没有史诗的观点截然不同^⑩，表现出了充分的民族自信心。

他主张，要重视收集少数民族甚至包括外国民族的“新分子”神话，以适应中国民族的发展。虽然这是“留待将来的问题”之一，但他当时已予以充分的注意。他特别提出要搜集西南的苗、瑶、壮各族的神话。这一点，不能不佩服他当年的远见。

茅盾在研究中，提出了许多有价值、对于神话研究十分关键的问题。有些问题相当深刻，至今尚无定论。例如他在《楚辞与中国神话》中提出，神话是宗教、伦理思想、宇宙观以及最早的历史的离奇地混合^⑪。今天，这个复杂而又重要的问题仍在探讨之中。有的认为神话是先于宗教产生的，如鲁迅；有的认为宗教先于神话，如袁珂；有的认为宗教、神话最初是一个统一体，如潜明兹^⑫。从现在的研究结果看，最后这种意见确实合理可靠些。早在二十年代，茅盾就肯定地提出这样的问题，可见其研究的深度和敏锐的眼光，也说明茅盾在神话研究上对后辈的影响之深。

茅盾在神话研究方面的巨大功绩是不可磨灭的。当然，他的全部神话研究，远远不是上述几点所能全部概括的。但在那样的历史条件下，在那样的时代环境中，茅盾所表现出的这些方面，无疑是弥足珍贵的。

三

无庸讳言，茅盾的神话研究，是存在着明显的不足的。

恩格斯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⑬又说，劳动使人发达起来，使社会结构发达起来，“法律和政治发展起来了，而且和它们一起，人的存在在人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宗教，也发展起来了”^⑭。作为想象的产物，神话也是和劳动一起产生的。所以，劳

动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着社会关系，更决定着和反映于艺术。而广大的劳动人民群众在社会生产中，任何时候都是主力军，艺术首先是产生于他们的，神话也不例外。此外，劳动者在神话的产生、保存、发展、演变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但茅盾在研究中，是忽视了这一点的，他既没有从理论上认识到社会生产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也没有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认识到劳动、劳动者在神话中的作用和意义。

马克思主义理论，还要求我们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正确认识历史，认识历史的各种产物。“部落联合体的出现和阶级国家的逐渐形成，是被客观法则决定的，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对原始社会说来，这是进步和提高，是社会的质变；但同时，它也是不合理的残酷的剥削压迫制度的开端。因此，在神话中表现了人们反对压迫，反对以强欺弱，反对掠夺欺诈，反对刑法和战争的热爱自由和劳动的情绪。”^②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考察，对正确认识神话的发生、发展、演变及其所反映的社会现实，研究神话发展规律，无疑至为重要。但是，茅盾在研究中，却是用人类学派的观点，抽象地从人们的思想、宇宙观及心理状态去考察神话，过多地从自然环境去考察神话，这就不免限制了对神话理论的进一步探索。

神话的艺术化，使之成为文学的一部分。甚至可以说，神话本身就是一门艺术。那么，作为人类精神生产中的宝贵财富，神话无疑具有独特的美学价值，揭示神话的美学价值，无疑也是神话研究工作义不容辞的责任。但是，茅盾却很少从这方面去研究神话，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不足。

神话学在中国发展到今天，已经完全得到马克思主义神话学理论的指导。如果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去衡量茅盾的神话研究，如果我们从神话学在中国的发展历史这个角度考察，我们便会发现，茅盾在中国神话学史上，是占有重要地位的，他的神话研究具有

现实的意义。

第一、与茅盾同时的研究者和他以前的研究者，虽然都从各自的角度研究神话，但很少有茅盾这么深广的。鲁迅虽然写了《破恶声论》、《摩罗诗力说》、《中国小说史略》等著作，其中论到了神话，并成为“我国近代神话研究史上最早出现的论及神话的有价值的文章”，具有重要意义，但是，鲁迅对神话的研究毕竟相当有限，他也没有继续研究下去。其他一些研究者，或是偏重于外国理论介绍^③，或是偏重考据，或是偏重于对某一类神话的研究，而不注重神话的基本理论，不能全面地探索神话的本质与规律。有的将神话作为某一科学的一部分来研究，如钟敬文先生，虽然早年研究过神话，且有成绩，但他却是把神话放在民俗学的范围来研究的，终于没有专门的系统的神话学著作^④。因此，在第一批研究者中，茅盾的贡献是突出的。

第二，茅盾的神话研究，吸取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同时又吸收了外国的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创新发展，达到了那一时期的研 究高度。他在对中国神话进行一番认真的搜剔之后，写了一批有价值的系统研究中国神话的专门著述。因此，他又是第一批神话研究者中的集大成者。

第三，茅盾在神话研究过程中所提出的一些问题，给我们以很好的启示。例如，在如何对待外来理论并正确运用于中国学术研究这个问题上，茅盾的做法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五四”运动及其以后，外国各种思想理论涌进中国，可谓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人不顾中国民族的土壤是否适合国外某些理论的种子生长，良莠不辨，盲目照搬。茅盾的神话研究却给我们以有益的启示：只有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有选择地借鉴运用外国理论，才能真正做到洋为中用，否则，一味地唯洋是从，只能丢掉中华民族文化之精华。这与一概拒绝外来理论一样，只能阻碍学术的发展。

结语

茅盾作为我国伟大的现代文学家，在我国新文学运动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人们对于他在文学创作方面的活动，正展开全面深入地研究。但相比之下，人们却往往忽视了他还是中国神话学的创始人之一，是一位有显著成就的神话学家，对于他在这方面的活动，研究的就更少了。《子夜》有口皆碑，而相比之下，《中国神话研究初探》则鲜为人知。这对于全面认识茅盾这样一位伟大的文学家是不够的，对于了解和探索我国神话学的发展道路，更是不利的。

前人的研究成果，是后人继以前进的基础。正是有茅盾这样的开拓者为我国神话学

铺开了道路，我们的神话学道路才越走越广。尤其是解放后，马克思主义神话学理论给我们的神话学插上了翅膀。除十年浩劫神话研究一无成果外，这些年，神话学有很大发展。其中象袁珂先生，成就是很大的。他写的《中国古代神话》、《古神话选释》等著作，“已基本理出了中国古代神话的头绪，结束了鲁迅所说‘中国之神话与传说，今尚无集录为专书者，仅散见于古籍’的状况”^⑩。现在，神话学正以新的面貌朝前发展，需要更多的人为之奋斗。对前人的研究也需要进行总结。我们从茅盾的神话研究中，不是得到了许多有益的启示吗？

（在本文写作过程中，曾得到潜明兹老师的指导，谨致谢忱！）

注释：

① 见《茅盾评论文集》上册P.3-4，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② 可参见叶子铭《论茅盾四十年文学道路》（上海文艺出版社1978年版）和孙中田《论茅盾的生活与创作》（百花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有关章节。1929年，茅盾出版过《神话杂论》，收有《中国神话研究》、《自然界的神话》、《希腊神话和北欧神话》、《各民族神话何以多相似》四篇，由世界书局出版。《中国神话研究ABC》1978年再版时，易名为《中国神话研究初探》。

③ 载《文学》1934年第7期，署名味茗。

④ 见《神话研究·序》，百花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

⑤ 同④P.14。

⑥ 见《民间文艺集刊》第一集P.48，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⑦ 见《茅盾评论文集》P.242，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⑧ 同上，P.323。

⑨ 《神话研究》P.8，百花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

⑩⑪ 见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P.426-430，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⑫ 郭沫若在1928年翻译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1932年由神州国光出版社出版；1930年3月4日，郭沫若写了《关于文艺的不朽性》，最早介绍并阐发了马克思神话理论。该文见《沫若文集》10卷，P.382，参见《民间文艺集刊》第一集，P.61。

⑬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1857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P.113，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⑭ 骞公杨《中国文学》，P.22，吉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⑮ 见《神话研究》中《中国神话研究》一文，百花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

⑯ 见《茅盾评论文集》下册《中国神话研究初探》第一章“几个根本问题”，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⑰ 同上，P.296。

⑱ 同上，P.323。

⑲ 如黑格尔在《美学》（中译本第三

卷, P.170)中就说,由于中国民族自古就形成了朴素、井井有条的观照方式,所以“中国人没有民族史诗…”(参见《闻一多评传》,P.274北京大学出版社,)当时,国内也有少数人附和这种观点,如胡适。

②0 《楚辞与中国神话》一文,载《茅盾文艺杂论集》上册,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②1 参阅下列篇目:和明远《原始神话与宗教的先后》(《民间文学论坛》82.3),潜明兹《神话与原始宗教源于一个统一体》(《北师大学报》哲社版81.2),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有关章节和袁珂《中国古代神话》(中华书局,1960年出版)。

②2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P.508,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②3 同上, P.515。

②4 杨公骥《中国文学》, P.37,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57年。

②5 如黄石的《神话研究》、林惠祥的《人类学论文集》。

②6 钟敬文先生有神话著述,但很零散,未能成册。参见《民间文艺集刊》第四集, P.229。

②7 冯天瑜《上古神话纵横谈》,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3年版, P.228。

国际学术交流 简讯二则

南京大学美国富布赖特基金会教授卡罗尔·纽鲍尔(Carol Neubauer)应邀于1985年5月,在我院对现代英语研究生和部分教师作了有关美国文学传统的演讲,并举行了座谈。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科特兰学院以院长克拉克(Clark)博士为首的五人代表团,应邀于1985年6月20日下午,前来我院参观访问。克拉克院长向我院全体师生作了题为“美国大学中的国际教育”的演讲,并回答了我院师生提出的问题。